

「後學」的興起及其困境

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猶如一種異常尖銳的挑戰」，「嘲弄着我們業已形成的『知識』」，「如何去描述『中國』，如何賦予當下的中國一個固定的『形象』」，又如何從「由西方文化霸權所支配的『知識』生產的關鍵的現成部分」中掙脫出來，「構成了一種有關『中國』的巨大的闡釋焦慮」^①。發生在90年代的「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文化論爭」，就是在試圖處理和面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產生、展開和變異的。它同樣沒有逃脫在「焦慮」中「闡釋」的命運。論爭持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從思想界到知識界，從國內到海外，眾說紛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即使在十年後的今天重讀那些論爭文字，人們仍然不難看見其中思想的掙扎，看見各種不同話語和權力爭鬥的遺迹，看見新的思想可能和理論範疇怎樣被引入。然而，殊為可惜的是，論爭雖然熱鬧一時，卻並未能為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的進步生產出有效的理論成果，後現代和後殖民的理論潛力及其應對當代中國社會狀況的思想可能也並未有效展開。甚至，不少知識份子對「後學」言說者們的鼓噪和作為還很有些不屑和鄙薄。「後學」的論爭終至於具有諷刺意味地被喜劇化為建立所謂「中華性」的偉大敘事^②。

今天，這一論爭的主體已經消散，問題的提法和側重點也已發生變化。今日中國出現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真正呈現了「現代性」展開過程中所出現的幾乎所有問題，「後學」要批判和面對的問題現實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無論在海外還是在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界，後現代和後殖民從理論生產到現實情景中都真正成為了炙手可熱的顯學，顯示出它在這個時代獨有的理論魅力和思想活力。這既令人深切地感到當年「後學」論爭之產生的正當性，也為它問題意識的有效性並未為今天的思想界所正視而可惜。那麼，重新清理十年前的那場「論爭」，或許是有意義的吧。畢竟，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需要不斷的「闡釋」，仍然面臨着如何「表述」和「想像」中國的「焦慮」。

今日中國出現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真正呈現了「現代性」展開過程中所出現的幾乎所有問題，「後學」要批判和面對的問題現實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顯示出它在這個時代獨有的理論魅力和思想活力。這表明「後學」論爭之產生的正當性。殊為可惜的是，論爭雖然熱鬧一時，卻並未能為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的進步生產出有效的理論成果。

* 本文是華東師範大學「211」建設項目「中國的現代性與人文學術」研究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一 「後學」言說：從多重焦慮的夾纏中出場

作為一個概念和理論思潮，「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文學、思想界幾乎是與現代主義一同出現的。1980年，董鼎山在《讀書》第12期發表題為〈所謂「後現代派」小說〉，在隨後幾年裏，袁可嘉等外國文學研究者陸續介紹了一些西方「後現代主義」的作家作品^③。1985年9至12月間，美國杜克大學詹姆遜 (Fredric Jameson) 教授在北京大學開設以「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為題的系列演講，成為「後現代」理論在中國濫觴的一個重要因素。「後現代」理論的引入不僅在文學理論領域，還在電影、美術等領域展開。從90年初開始，《當代電影》雜誌開設「電影之外」欄目，刊發中外學者關於拉康 (Jacques Lacon)、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等理論研究以及「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學、電影的研究文章^④。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言說開始在當代中國的外國文學、文學理論、電影研究、美學等領域傳播。不僅一些後現代主義的非經典理論陸續被翻譯和介紹進來，張頤武、陳曉明等人還開始運用後現代理論的觀念和方法處理和批評當代中國文學。「後現代」作為外來理論和文化之一種，成為當時中國文學、理論討論中的一枝，有限度地產生着它作為文學批評的方法和視野的影響。在1993年的《鍾山》、《文藝研究》等刊物，相繼發表王寧、陳曉明、張頤武、戴錦華等人的系列筆談和座談文章，引入「後現代主義」概念討論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化和文學藝術創作。他們認為，後現代主義即使不算是一種對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的獨創性認識，那麼也可視為一種有意義的再認識^⑤。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內在的變化和西方理論潮流的多重影響，為中國「後學」言說的興起提供了條件。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化還在於文化工業的興起和大眾傳媒的國際化。全球化的語境在中國社會文化中愈來愈顯著。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在西方世界屢屢獲獎，獲得廣泛的讚譽。他們的電影大多以講述神秘詭異的「民俗」來抽象—隱喻—表述「中國」，以表現被壓抑的欲望和奔放狂野的個性之間的激烈衝突與西方審美趣味相勾連，建構西方的「中國想像」。他們利用跨國資本的投資，採取經由國際市場迂迴國內市場的市場模式，為在商業、藝術等多重矛盾中夾纏的中國文化藝術提供了「想像性」解決方案。第五代導演的巨大成功使他們成為90年代中國的文化英雄。但「這種類型化的『藝術電影』不再是面對本土觀眾的選擇，而是為西方提供欲望與幻象的滿足」，「張藝謀和陳凱歌的執着的追求和過人的才華」，「使他們成為西方話語的某種『轉換器』，以藝術的表意將『中國』轉換為一個『他者的神話』」^⑥。以張、陳等的電影為代表的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就既為西方中心話語所創造又參與了創造「中國他者化」語境的歷史過程。西方學術界流行的後殖民理論也因此而在中國具有了很強的當下性。

質言之，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之所以在中國形成討論的熱點，首先是由於整個社會對市場的焦慮，作為對世俗化潮流的一種反應，「後學」話語的出現試圖改變知識界面對社會變化的失語狀態。過猶不及的是，「後學」還試圖在摒棄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言說開始在當代中國的外國文學、文學理論、電影研究、美學等領域傳播，有限度地產生着它作為文學批評的方法和視野的影響。王寧、陳曉明、張頤武、戴錦華等人引入「後現代主義」概念討論文學藝術創作。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在西方世界屢屢獲獎，既為西方中心話語所創造又參與了創造「中國他者化」語境的歷史過程。西方學術界流行的後殖民理論也因此而在中國具有了很強的當下性。

現代的啟蒙話語的同時，肩負起如何對抗西方中心，建設具有中國民族(本土)特色文化，形成「後殖民時代」「中國版」批評理論的重任。「中華性」的提出就把這意圖及其焦慮推到了極致^⑦。多方面的問題夾纏在一起，形成在90年代中國思想論爭中的所謂「後學」言說風潮。

二 知識份子何為：從言說到論爭

後現代、後殖民論爭在《二十一世紀》上的展開，使得「後學」言說走出了文藝理論批評的狹小空間。這不僅在世俗意義上提升了「後學」論爭的影響，客觀上也使「後學」言說的理論邏輯和背後的企圖得到了認真的詰難和追問。海外漢學界的論爭與中國的「後學」討論很快合流，一起移師《二十一世紀》、《今天》等同樣是在海外的中文雜誌，把整個90年代中國「後學」論爭推向高潮。

中國大陸文藝批評領域的「後學」言說演變為後來在90年代有影響的思想論爭，還得益於海外中國學人的加入，借重於《二十一世紀》成為論爭的主戰場。1989年事件之後，中國大陸思想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陷入了沉寂。驚弓之下的中國知識份子甚至不知道有意味的思想討論該如何開啟，更不知道底線何在。原來的話語既無法繼續同時也失效，除了退回書齋討論學術規範之外，國內原有的刊物要麼被關閉、轉向，要麼受到各種掣肘。因此，以「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為旗幟的《二十一世紀》，在90年代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裏接續了中國大陸學術、思想界未能延續的學術、文化、思想言路，開展了不少既是學理的又是活的社會思想文化討論。這使得《二十一世紀》成為當時幾乎是唯一的在海內外華文學術和思想有着重要影響的學術、思想陣地^⑧。後現代、後殖民論爭在《二十一世紀》上的展開，使得「後學」言說走出了文藝理論批評的狹小空間。這不僅在世俗意義上提升了「後學」論爭的影響，客觀上也使「後學」言說的理論邏輯和背後的企圖得到了認真的詰難和追問。

當80年代國內最富活力的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批評在90年代初出現文化轉向的同時，一批留學北美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華裔學者也在尋求新的研究範式下新的理論及其批判的可能。他們從現代文學研究出發，試圖把中國文學、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化納入到世界文化和社會變遷的視野中考察，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有意識地與西方當代文化批判理論接軌。1993年1月，留美學者劉康在《現代中國》(*Modern China*)上發表英文論文，藉對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評論，批評美國漢學界在現代文學研究上的政治化傾向，指出這種政治化傾向的背後是西方中心主義下的審美想像^⑨。同期雜誌還有組織地刊發了另外三篇漢學研究的商榷文章。這些論爭表面上圍繞着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經驗展開，但它的背後顯然有意借用和嵌入了流行於北美學界的後現代到後殖民主義的文化理論與方法。這一海外漢學界的論爭與中國的「後學」討論很快合流，一起移師《二十一世紀》、《今天》等同樣是在海外的中文雜誌，把整個90年代中國「後學」論爭推向高潮。

對於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化，論爭各方都有目共睹。論爭出現在對這一變化各自不同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對未來的不同判斷，「後學」的理論批判力是不是在言說過程中得到展開等幾個方面。在徐賁看來，「對於後殖民理論來說，第三世界理論的關鍵是反壓迫，而不是本土性，它們的出發點也正是特定

生存環境中人們所面臨的切膚壓迫和現實反抗。」而中國「後學」的核心是「本土性」而不是反壓迫。「雖然中國第三世界批評努力與官方民族主義話語保持距離，但它卻始終小心翼翼地避開對後者的分析批判。而且，正是由於它的『對抗性』批評只有『國際性』，沒有『國內性』，因而它不僅能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相安共處，而且以其捨近求遠、避實就虛的做法，順應了後者的利益，提供了一種極有利於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和化解的所謂『對抗性』的人文批判模式。」^⑩也因此，趙毅衡要視中國「後學」的出現為中國「新保守主義」的抬頭了^⑪。1989年事件之後，知識群體普遍的沉寂和緘默固然有因學術轉型而難以言說的困境，但也由於他們普遍的與官方不合作態度。「後學」言說「自我唾棄精英地位或責任」，在精神上「對五四和80年代兩次文化精神高揚」予以「清算」，在「多元文化」的旗幟下為當代俗文化開道，在現實中有着明顯的利益集團傾向，難怪要為當時低迷和壓抑的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難以容忍甚至鄙夷了。徐賁和趙毅衡所批評的，大陸知識份子未嘗沒有看到，只是囿於情勢，他們難以把問題攤開來說，也不屑於與這樣的言說（甚至包括人）對話。「後現代」也好，「後殖民」理論也好，它在根本上是一種與現代性理論不同的價值取向，一種源於現代性的矛盾性的反思性理論邏輯，一種對西方中心主義文化霸權的邏輯從結果回溯分析立場和方法的深刻批判。汪暉就說：「『中國的後現代主義』否定掉的是『新啟蒙主義』的嚴肅的社會政治批判，他們對一切價值進行解構的同時，卻沒有對構成現代生活主要特徵的資本的活動作出分析，也沒有對這種資本的活動與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關係作出評價。」這其中「隱含的是他們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擁抱大眾文化（虛構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場化形態）、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態重返中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⑫在現實生活中，「後學」言說中的一些人在「海馬歌舞廳」開張以後，也正是欣然放下身段進入舞池中央翩翩起舞，接受「文化大款」的「委任狀」，為「新狀態」的到來而擂鼓助威的。知識份子批判性的立場和使命果然被排斥和喜劇化。套用當下流行語彙說，「後學」言說的問題出在思想動因（起點上）「政治不正確」，在理論適用上（過程中）的「買櫝還珠」。

張隆溪還把批評的鋒芒指向了中國「後學」言說的修辭手法。他不客氣地指出，在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的大部分篇幅裏，都以整個中國或中國大陸批評界發言人的口氣說話，「以第三世界中國反第一世界西方為立言之本」，「使一切批評者閉口，誰批評他，誰就是以『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權』去壓制第三世界的中國，去把中國『再度變為一個馴服的他者』」^⑬。中國的後現代和後殖民主義言說在接過了西方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外殼的同時，掏去了它的理論核心，把批判性的解構理論逐譯成宏大的理論建構，並試圖以此來建構自己的話語霸權。在現實策略上，中國「後學」家們利用了西方後現代在當時中國學界的陌生化效果，借用了國際（西方）學術界的文化霸權。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國後現代主義者利用後現代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論證的卻是中國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們所謂『中華性』的建立。在這種典型的現代性宏偉敘事中（雖然打着後現代的旗號），中國的所謂後現代主義者對中華性的未來性預

「後學」言說「自我唾棄精英地位或責任」，在精神上「對五四和80年代兩次文化精神高揚」予以「清算」，在「多元文化」的旗幟下為當代俗文化開道，在現實中有着明顯的利益集團傾向，難怪要為當時低迷和壓抑的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難以容忍甚至鄙夷了。也因此，趙毅衡要視中國「後學」的出現為中國「新保守主義」的抬頭了。

見不僅沒有觸及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位置變化，而且與傳統主義者有關二十一世紀的預言和期待完全一致。」^⑭這樣的批評無疑是深刻的。

中國「後學」家們這樣言說中國意義的「後現代」理論和手法受到思想界鄙薄的同時，也消解了後現代、後殖民理論在當時情景下應對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變化的正當性和有效性。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後現代」話語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變化過程中雖然有它們所針對的現實情景，而當時的中國大陸學界卻沒有人願意嚴肅、認真地拆解和辨析它們的理論缺陷和思想困境。在另一方面，從80年代初開始，「一大批中國的年輕人離開故鄉，遠渡重洋，到美國和歐洲開闢新的生活」，「雖然也能謀得一份穩定的職業，心卻老也安不下來」，「時時會尖銳地感覺到精神無着的苦惱」。再加上批評作為職業的要求，對主流理論的依附／反叛的心理，「後殖民」—「後現代」理論正好為自己「邊緣」性的地位和生活體驗做闡釋了^⑮。這些躲在批判的姿態背後世俗社會的庸俗與投機，與理論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纏繞在一起，構成了海外言說的中國「後學」論爭的現實困境。「後學」論爭當真很快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90年代被「後」掉了。

後現代、後殖民言說在90年代初的中國出現和風行，既受到西方主流學術理論的影響，更是回應中國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變化的結果：反映了「言說者」們在借用西方理論和思想方法應對轉型時期中國社會文化出現的新狀況方面表現出的良好的問題意識。即使是在十年後的今天，這種對當下社會變化的敏銳感覺和問題意識仍然值得稱道。

三 新的可能還有嗎？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情景下，由於知識份子群體逐漸被體制化，文化資本轉換成社會資本，地位提高，來自底層和民間的訴求和歌哭於他們變得遙遠，其中一部分人已經匯入到了主流意識形態建構和維護的隊伍中，複雜化了80年代作為「整體」的知識份子群。因此，知識份子「天然」的批判立場及其有效性，代言「邊緣」、「底層」、「弱勢」群體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一方面，如何認識和闡釋中國，成為90年代後期以來知識份子內部分化的標誌，紛擾一時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論爭就包含了這樣的內容。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知識份子的重新「在地」化變成一種從外在到內在的深刻要求，知識份子群體的「有機化」問題被「顯豁」化。當現代性過程中那些內在的結構性問題在中國社會更加現實和嚴酷地展開以後，「後現代」理論的反抗性邏輯就變得特別珍貴和迫切起來。在這樣的意義上，「後學」話語的言說的正當性值得肯定。

後現代、後殖民言說在90年代初的中國出現和風行，既受到西方主流學術理論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更是回應中國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變化的結果。這些話題的出現無疑表現了「後學」言說者們對中國社會「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敏銳洞察，也正反映了「言說者」們在借用西方理論和思想方法應對轉型時期中國社會文化出現的新狀況方面也表現出的良好的問題意識。即使是在十年後的今天，這種對當下社會變化的敏銳感覺和問題意識仍然值得稱道。「後學」言說者們的困境背後或者正應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說的，「這個世界是為作為象徵性方面和物質性方面活躍的、有效的資本而存在的，它處於行動者所能顯現的範圍之內。文化資本是作為鬥爭中的一種武器或某種厲害

關係而受到關注或被用來投資的，而這種鬥爭在文化產品場和社會鬥爭場中一直綿延不絕。」^⑩薩依德 (Edward Said) 所謂決不「流向權力」，更不被權威所僱傭的知識份子大約也只是奢望吧，尤其在今天，當消費主義不只是一種社會現象，更作為一種當下中國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一種意識形態操控着整個社會文化的時候。

註釋

- ① 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4月號，頁128。
- ②⑩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汪暉：《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69；68-69。
- ③ 參見陳曉明：〈後現代主義·前言〉，載陳曉明主編：《後現代主義》(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1-7。
- ④ 參見《當代電影》(北京)，1990年第2、5、6期，1993年第3期，1994年第5期。
- ⑤ 參見王寧、陳曉明、張頤武、蔣原倫、孫津、盛寧、王斌：〈「後現代」筆談〉，《鍾山》，1993年第1期，頁170-82。
- ⑥ 參見張頤武：〈後新時期中國電影：分裂的挑戰〉，《當代電影》，1994年第5期，頁4-11；張頤武：〈全球性後殖民語境中的張藝謀〉，《當代電影》，1993年第3期，頁18-25。
- ⑦ 在1994年第2期《文藝爭鳴》上，張法、張頤武、王一川發表了他們寫作於1993年4月到1994年1月的宣言式論文〈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他們試圖建構「中華性」以取代現代性，既在現實上解決發展的焦慮，又在理論上完成抗衡「第一世界」文化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構造，打造「後現代」情景中的中華版的「後殖民」批評理論。這一處心積慮的宏大敘事不僅完全露出了中國「後學」的大破綻，更表徵了中國知識界普遍存在的「大國」心態和「發展」的焦慮。
- ⑧ 《二十一世紀》和《今天》雜誌在90年代初期的大陸是不允許公開銷售的，但總可以通過私下郵寄、夾帶入境等各種途徑進入大陸知識界和思想界，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二十一世紀》由於其更強的學術性和大學背景，被禁的程度稍輕，《今天》則更敏感，出刊也不定期，所產生影響相對有限。
- ⑨ Liu Kang, "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no. 1 (January 1993): 13-40.
- ⑩ 徐賁：〈「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頁17。
- ⑪ 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頁4-15。
- ⑫ 同註②，頁69-70。汪暉此文初稿寫作於1994年，中文版最初發表於《天涯》雜誌1997年第5期並引起巨大反響。
- ⑬ 張隆溪：〈多元社會中的文化批評〉，《二十一世紀》，1996年2月號，頁20。
- ⑭ 參見王曉明：〈在批判的姿態背後〉，《二十一世紀》，1994年4月號，頁138。
- ⑮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99-200。